

电视片、纪录片、综艺片、融媒体产品……

文化遗产传播有多少种可能

艺苑

从文化节目《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创新表达让“中国节日”火遍全网、走向世界,到文化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助力世界遗产“活起来”;从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受网友热捧,再到逛博物馆成为中国社会“新风尚”……当下,内容精彩、形式多样、创意十足的各类文化遗产传播方式,日益得到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发自内心的喜爱和亲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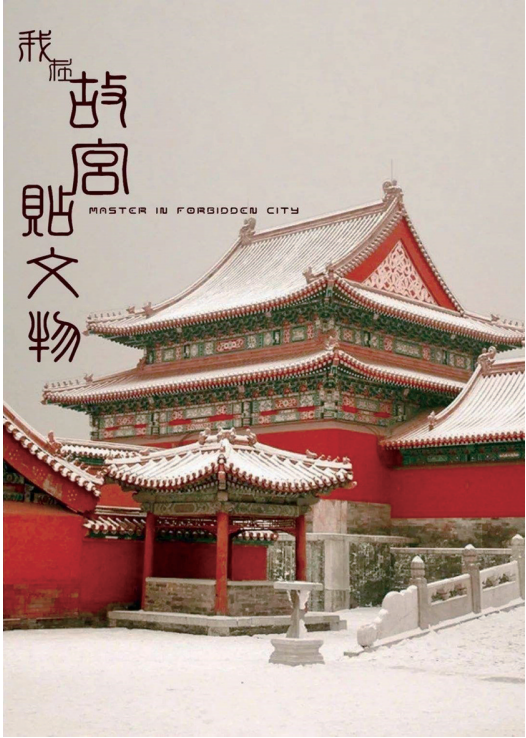
综艺,助力世界遗产破圈

中国目前拥有56项世界遗产,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共同织就了一张熠熠生辉的世界遗产网络。

世界遗产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国家宝藏》《传承者》《遇见天坛》《最美中轴线》《万里走单骑》……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一系列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文化节目,绽放出绚丽多彩的文化魅力,为观众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提高了观众的文化素养,提升了文化自信。

故宫博物院是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是文化遗产大众传播的“先行者”。通过不断跨界融合、开放创新,古老的故宫文化与日新月异的时代科技和传播方式“碰撞”出越来越多公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成果。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年轻观众中好评度极高,甚至显著提升了年轻人应聘文物修复工作岗位的热情;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推出三季《国家宝藏》、与北京卫视推出《上新了·故宫》等“文化+综艺”节目,为博物馆开创了藏品阐释与展示的新方法,创新性地连接了电视综艺、博物馆和公众。

浙江卫视《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节目组提出“让世界遗产‘破圈出道’”的口号,通过“网红院长”单霁翔率领“布鞋男团”在12个遗产地的深度体验,与历史考古学者、遗产守护人及当地民众和游客之间的趣味性互动解读,将世界遗产中承载的厚重历史生动鲜活地呈现出来,带领公众进行“文化之旅”,讲述“寻找与守望”的



精彩故事。在一次次寻找、行走、交流、体验、守望中,初登综艺的世界遗产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悟古老文明所传递的文化力量。

今年,河南广播电视台创新传播手段,精心推出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如《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受到社会极大关注。这些节目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达到了传承文化精髓、实现美美与共、融入日常生活等多元立体的传播效果,盘活了河南的文化资源,激发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随着各种传播手段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和探究遗产的价值和文化内涵,有些人把遗产地当作旅游目的地;在感受世界遗产与美好生活之间联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业中。当然,与大多数仍然“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界遗产及其尚待挖掘的文化内涵相比,这还远远不够。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弘扬与发展,还需要注入更多现代科技和媒体融合的鲜活力量,助力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走出去”,走进千家万户,

浸润更多心灵。

传播,激活文化遗产价值

文化需要不断地被发现、被传播,才能获得新时代的生命力,才能更好地流传下去。世界遗产传播内容与方式有多少种可能?在日前召开的“世界遗产的大众传播专项研讨会”上,来自文博和新闻传播领域高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专家学者,畅谈了各自的思考和建议。

“世界遗产的价值需要通过传播来激活。”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胡钰看来,“最核心的就是要创意传播。”他提出,在制作相关文化综艺节目时,要注重提升整个节目的青春度,增加更多普通青年人的参与、增强青年人的传播,并提前在青年文旅开发方面布局。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进而指出,在文旅融合的新时代,可以通过融媒体体的新方法,“吸引人们跟着文化去打卡,走进世界遗产地,并借此引领新一波世界遗产的社会关注度”,带动遗产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福祉提高,向世人展现和推广遗产里的中国美誉度。

“世界遗产的大众传播要做到四个转化。”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说,“就是把专业的内容大众化、把知识的内容生活化、把古老的内容现代化、把中国的内容国际化。”他以《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为例进行分析后表示,上述四个“化”难度很大,但是节目组已经有了很多经验。他建议,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提升温度、提升亮度、提升活跃度、提升参与度;寻找每个遗产点和当代人更多的共情点,让遗产点更亮丽时尚,打造话题活跃度,提升节目影响力。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参与过若干次以文化遗产为核心的电视节目创作,感触颇深。他说:“文化遗产的大众化传播应当以自信为根本,爱国为灵魂,国风为底色,时尚为韵味。”他希望通过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让拥有辉煌过去的文化遗产有尊严地活在当下,在创新中走向未来。

发掘文化遗产传播的各种可能性,本是文化遗产传承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文化遗产只有被广泛传播,才会被公众接受,才会引起更多社会群体关注,从而被传承下去。正如《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第二季所追求的“从年轻态、中国故事、烟火气三个维度塑造可感知的世遗行走之旅”,让文明成果实现全球共享,让中国智慧感动世界。

□李韵

思想者

两人的早期作品,都以绵密和精细见长,尤其在描摹女性方面,均能直入内心、曲尽其微,敢言他人之不敢言,从而收获了大量粉丝。

1936年,丁玲已经风靡一时,张爱玲正在读高中。后者是前者的粉丝,还特意写了一篇表达崇敬的文章,发表在校刊《国光》上。其中有这么一段:

丁玲是最惹人爱好的女作家。她所做的《母亲》和《丁玲自选集》都能给人顶深的印象……《莎菲女士的日记》就进步多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莎菲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女性们。

的确,两“玲”之间有着许多相似:都是出身于富庶人家的娇小姐,都敢于冲破世俗的家庭和爱情,都踩着繁华的上海滩成名,都有着一系列罗曼蒂克却又凄凉的生活史,只是丁玲比张爱玲年长16岁。从张爱玲的创作来看,便能读出颇受丁玲早期作品的影响。

如果丁玲沿着早年的创作之路走下去,很可能就是另一个张爱玲,是一个“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语)。但时代际遇和风云召唤,促成了丁玲人生道路的转变——这一年,她没有继续留恋上海孤岛,而是果断选择走向延安,走向人民、走向最火热的生活。

正是激情燃烧的延安生活,使丁玲开始面对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于是,她作品的风格也开始向粗犷豪放转变,委婉细腻已不再是其主调——她在解放区写出了《水》《奔》《夜》《泪眼模糊中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一系列风格迥异的小说。

1946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后,丁玲背起包袱,来到桑干河畔,实实在在地与她根本不熟悉的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农民从几千年封建压迫中挣扎出来的伟大力量震撼了她;农民淳厚、质朴的品质吸引了她;“土改”中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丰富了她。她走家串户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逢到分浮财,有的老太太挑花了一眼,不知拿哪样好,她总是

帮忙挑选。正是如此深入的现场体验,才使丁玲的创作不是从概念和公式出发,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真实地书写,从而创作出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张爱玲则继续着一如既往的小资情调生活,先后创作和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在女性幽深的心间小路上徜徉,捕捉着她们心弦的每一次震颤、灵魂的每一丝悸动,将她们百无聊赖中的寂寞无奈、恋爱中的矛盾忐忑、追求情爱和梦幻的欲望躁动表现得丝丝入扣。尽管她在人性书写的道路上越挖越深,并拥有了相当多的读者——然而她与丁玲在创作道路上渐行渐远,终于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和模样。

客观说,张爱玲似乎拥有更多读者,而丁玲则更为文学史家所关注。

自古以来,真正伟大的、经典的文学作品,无不来自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描写最广大人民群众波澜壮阔的生活,肯定存在于作家的渺小生活之外。这就需要作家走出自我,走向大我。如果一个作家只是善于和乐于描写自己熟悉的小圈圈,虽然可能创作出一系列精致的作品,虽然可能赢得更多读者,但总是小盆景、小制作、小匠心,与伟大相去甚远,与人民泾渭分明。

丁玲则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际行动,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确实又是一个根本性的话题。当下的新时代生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转型期,世界一体化、信息全覆盖使得我们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全新生态。作家艺术家只有积极主动地走出自己已经熟悉的、舒适的、习惯的生活,走进更广阔、更基层、更陌生的领域,去学习,去热爱,才能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并进行美的创造。

丁玲、柳青等无数前辈作家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从中汲取无尽的营养,获得不竭的灵感。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的精品力作和史诗性巨著。

只有这些,才是最真正的中国故事,最真实的时代历史。

□李春雷

塑造新时代农民企业家形象

——读韩文平长篇小说《屠夫》

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王蓬、高建群,陕西现当代几代作家都有着浓厚的关注并表现农村、农业、农民的优良文学传统。《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浮躁》《秦腔》《村子》《爱情心理探索》系列,《大平原》《最后一个匈奴》等长篇小说都是当代中国文坛具有重大影响和良好声誉的农村、农业、农民题材的长篇小说,至今仍然成为广大城乡读者的喜爱。他们以其来历、亲切的农村、农民生活体验、深刻的思想和智慧为人们再现和复制了从近现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农民的奋斗史、心灵史、创业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更有不容置疑的文学价值!但是,这些年来随着这些创作队伍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先后离世,一些人年事已高,特别是农村、农业体制的变化,城乡差别的缩小,曾经享誉中国文坛的陕西“农商城籍”作家创作队伍却有难以为继的衰退趋势。当此之时,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家韩文平先生的长篇小说《屠夫》却给人眼前一亮的欣喜!

《屠夫》的最大成就就是为最新陕西、乃至中国文坛贡献出了一个崭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青年农民形象。他姓屠,排行老四,是一个返乡的复员军人,因为奉行老祖父制定的家训:“吃亏,实在,身子正。”为人实在、正派而被群众推举为金城县桑树乡屠家庄党支部书记。但是,他的一步步成功,却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深得民心的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思想路线。

他大公无私,在村领导班子中给自己评最少的补贴,千方百计解决群众中的困难户,帮助他们找对市场路子,屠宰致富。为了解决私屠滥宰,缺斤少两,以病死猪、注水肉冒充好肉,破坏村子形象的不良行为,将县市防疫、检查部门请进村子设点,随时诊疗,保证了产品质量,赢得了广大客户肯定。接着

他又在村集体闲置荒地中划片招标,联系县上有关部门,建立屠宰、检疫、销售、监管、税收等机构和制度。随着村子屠宰事业的发展,他又贷款引进了机械化、现代化的生猪屠宰生产线。屠家庄人富了,有钱了,他又请邮电部门为村子安装了五千部直通电话,村民们做生意可以电话、视频直通全国,乃至香港、澳门、东南亚。他成立了集农、工、商一体的实业总公司,下设基础设施、建材公司、屠宰公司、农业科技公司,成为全市的“小康示范村”……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的致富带头人,却被副书记、村主任诬告,个别领导听信谣言,将他隔离审查、监视居住,最后离开了自己一手发展起来的村子。

是金子总会发光,屠老四后来联手秦岭山麓的午午公司,在这里他实现了自己在屠家庄没有实现的理想,创立了午午集团公司,成为全省著名的企业家,并以子午总裁的名义与金城县签订了一个项目,投资一亿五千万打造一座集生产、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大型集团公司,它的总部就设在他的伤心地屠家庄。而一直以屠老四为敌的余开河却在窃取村中权力、寅吃卯粮、挥霍无度中孤独老去。

正如作者针对余开河的落台所愤慨之言中说:“其实,余开河根本不在乎乎民船的沉浮,他在意的,只是本家的得失。说得更具体些,他其实在乎的,只是他个人。”“这年头,要办成几样事情就得得出以公心,否则,连自家的事也管不好。人要是私心重了,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就别在公家行列里站,否则到头来就是焦头烂额。”真是直言快语,一语中的。书中借主人公屠老四的口,道出关于“小农经济”的议论,颇有见地!

笔者只是应乡党葛宽国之请读了一遍《屠夫》,但猜想它的作者必也是一个激情四射、很有思想之人。本书大概有50余万字,我在阅读中感到它还有删削余地,取掉10万字过程性的交代,可能对主人公形象有好处。

□李星

新书推荐

马富明先生的《马聪文集》主要研讨一代国学大师、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教授一生凄凉的传记。吴宓教授是泾阳安吴堡人,和我是同乡,但不是一个时期的同乡人。我从小出生在泾阳县安吴堡,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对吴宓教授的人生也略知一二,当时吴宓教授逝世时,因从梁平劳改回来,一直在泾阳西关面粉厂,其堂妹吴须曼那里度过生命的最后。

吴宓教授,一个被文化名人的再发现,还得从吴宓教授平反时说起,研究吴宓教授,那是一本大书,非一个人所能的事。“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要喝水,我要吃饭。”这就是吴宓教授在其生命之烛将燃尽之时,发出的最后一声呼唤!将这最后的呼唤传向社会的,恰是吴宓的乡亲马聪先生。因此,我将吴宓“再发现者”的光圈戴在马聪先生的头上。吴宓的冤案虽于1979年平反,但关于他对我国现代文化发展作出的不应被忽视贡献的研究却沉寂下来。1987年3月10日,《人民政协报》刊发马聪文章《历史不会忘记》,再度激起了学术界研究吴宓的热潮。

马聪先生出生在陕西泾阳县,他同吴宓教授

吴宓教授的凄凉一生——读《马聪文集》有感

是乡党。他肩负着泾阳县乡镇文化事业发展的重任,从一个村镇到一个村镇的游走,这浓厚的乡情、浓浓的泥土气息铸造着他、浸润着他。但泾阳县狭小的境域并没有局限他的文化视野,泾阳县固有的文统脉运和他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接受的西方文化熏陶,恰恰氤氲了他中西兼容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视野。因此也有了马聪先生对吴宓教授诸多研究成果的问世。此外,对马聪先生文学创作的产生,也应作如是观,作如是解。

1976年吴宓教授病重,又被迫退休,从西南师范学院回原籍泾阳居住。从此吴宓教授便在其胞妹、泾阳面粉厂职工吴须曼的照料下,在泾阳西关一家简陋的民宅里留住下来。

吴宓教授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文化教育

实体书店如何挺过寒冬

据媒体报道,近来言几又书店陷入欠薪风波。作为书店行业的知名品牌,言几又的现状牵动了业界神经,也引来了部分自媒体对网红书店的笔伐,认为网红书店“虚有其表”。

“最美”书店,一度很红火

作为“实体书店2.0版”的网红书店,是互联网兴起之后,书店行业遭受电商重击之下,努力自救的产物。

相关数据显示,受消费者购物习惯改变和地价上涨等因素影响,2008年到2012年,全国倒闭的民营书店已多达万家。为应对这一颓势,实体书店开始在多业态经营和空间体验感方面下功夫,努力打造“最美”书店。包括言几又、西西弗和钟书阁等,都是在这时期创立的民营连锁品牌书店。

“最美”书店,凭借靓丽的颜值、精致的文创、时尚的餐饮,自然吸引了媒体关注,甚至一跃成为网红。它们一改过去实体书店店面貌陈旧、功能单一的状况,吸引了不少年轻读者到店消费,一度被业界寄予厚望。

最红火的时候,言几又在全国拥有60几家店面,2014年至2018年4轮融资总金额达数亿元。仅2018年在西安新开的迈科中心店,面积就达4500平方米,投资过亿,由日本知名建筑设计师操刀设计。

业界人士认为,对书店经营者而言,坪效是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即每坪(1坪=3.3平方米,编

者注)面积上可以产出的营业额。书店若是过于注重空间的体验感,会在无形中降低坪效,提升经营成本。若把人吸引进来后,不能凭借实力把客流转化为稳定的营业额,将难以长久经营。

“红”与“不红”,都面临生存压力

书店的核心竞争力是书,但是不得不承认,现实中很多坚持卖好书的实体书店,同样也面临经营难题。

那么,如何看待网红书店的闭店行为?

“有一部分是市场的自然淘汰,有一部分是缘于疫情和网购的双重冲击。”中金易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营销中心负责人周耀光说。

在北京拥有两家实体店面的纸老虎书店总经理杨景新说:“2020年营收同比大幅下降。2021年,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环境下,截至11月底,营收比上年度提高30%,但和疫情之前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杨景新认为,作为民营实体书店,纸老虎在疫情冲击下能够屹立不倒,首先离不开市政府及相关区政府及时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书店采取根据到店客流量决定营业人员数量的轮岗机制,尽量节约成本。

在西安拥有数家店面的陕西嘉汇汉唐书城策划总监李纯说:“图书经营占比逐年下滑。依靠自身品牌,我们才在近两年保持书店盈亏平衡,且略有盈利。”



“走出去”,或是实体书店的破冰之举

在江西南昌经营近30年,以人文社科书籍为主打产品的青苑书店,现拥有3家实体店,并为当地3家公共图书馆提供运营服务。

“疫情期间,最困难的时候就要发不出工资了。经营多年,我们其实已经拥有了稳定的私域流量,凝聚了一批有消费能力的高端读者。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会员们发过一篇文章,呼吁他们储值,帮书店渡过难关。会员们很给力,短短几天,我们筹到了数十万元资金。但是,这绝非经营的长久之计。”青苑书店负责人万国英说。

青苑能够渡过难关并持续经营的秘诀在于——积极“走出去”。凭借选书眼光,他们为南昌当地十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购书服务,服务对象包含法院、银行、市政公园集团等。

满城书香,是衡量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实体书店的兴衰,或许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营问题。

□韩寒

资讯